张之洞与戊戌维新

冯天瑜

Althrough Zhang Zhidong drew close to reformists for a time in 1896, helping to finance their publications, he did not truly support the reform movement. Even at the time of his most harmoniovs relations with liang Qichao and other reformers, Zhang remained uncompromising in his attitude toward all opinions that violated feudal ethics. The Contradiction sharpened as the reforms progressed, and in 1898, to serve his own interests, Zhang wrote Exhortation to learning a frontal attack on reformist thought. this amplified both the connectednes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elt－streng thening official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9 世纪末叶，张之洞日渐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80 年代中期，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氏因在中法战争间的主战态度和运筹帷幄之功而赢得“天下之望”；1889 年以后，在湖广总督任上及暂署两江总督之际，更以兴实业、办学堂、练新军的实绩享誉中外，威望直追长期主持北洋的李鸿章，时人言：“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①而 90 年代中期以降，因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声名狼藉，张之洞则上疏力阻和议，并大声疾呼“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②其救亡、革新之议与公车上书诸士人同调，张之洞因之被舆论界推重为能够挽回天下大局的“朝廷柱石”。在张之洞方面，为谋求发展，也有靠拢活跃于朝野的受到帝党倚重的维新派人士的意念。而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政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时的中国政坛又风云变幻，主观要求与客观环境均促成张氏与迅速演进的变法运动逐步发生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展现一幕又一幕谲诡变化的戏剧。

一、从列名“强学会”到封禁《强学报》

1894 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中国海陆军全面崩溃。翌年五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更加紧迫的瓜分危机。全国士民悲痛而愤慨，康有为号召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余人联名上万言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故梁启超后来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③光绪帝也因甲午惨败而深受震动，认为非变法不能立国，一味对外妥协的后党慑于民众的磅礴正气，不得不暂时放松对舆论的控制，变法运动在这种情势下得以长足进展。1895 年 8 月，经康有为联络，由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该学会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又创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每日印一二千份分送朝中权贵。康有为受学会委托，作《强学会叙》，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局及成立学会挽救时局的宗旨。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以及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强学会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列名会籍或支持学会者，有工部主事康有为、举人梁启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大学士军机

大臣李鸿藻、内阁中书杨锐、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等人。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北京任主事，亦为京师强学会“发始”者。此外，提督宋庆、聂士成“咸捐数千金”，道员袁世凯也捐金五百元入会，一些封疆大吏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亦捐款列名“赞助”。李鸿章也企图跻身强学会行列，但他刚签订《马关条约》，被国人唾骂，维新派以其“于政治上为公敌”，故李鸿章“捐金二千入会，同会诸子摈之。”④可见，1895年夏秋，实兼学校与政党的强学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政治团体，朝中大臣“趋之若骛”，以列名入会为荣。作为一个有影响的疆吏，张之洞当然也要与强学会发生关系，强学会诸人也对其深寄厚望，于是张氏捐银五千两，列名入会。这样，强学会内有常熟（翁同龢为常熟人——引者），外有南皮，名士入会者千计，集款亦数万。不过，因张之洞此时暂署两江总督，坐镇江宁，没有直接参加京师强学会的活动。

经过《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一段短期沉默，1895年10月，慈禧及其后党在帝俄支持下卷土重来，开始对集结在强学会旗帜下的变法运动发起攻击，大学士徐桐等，上疏指责康有为企图谋反。康有为得友人密告，于这一年10月17日将强学会会务交给梁启超，自己离开北京，10月，“入江宁，居二十余日”，着力于运动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

康有为与张之洞发生关系，始于1886年。当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康有为请张鼎华转求张之洞开局译书，张未允。而1895年10月康有为以北京强学会主将身份赴江宁，再度联络张之洞，情形“今非昔比”，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有为认识到，上海是“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⑤，特请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上海和南京分会，张之洞则“颇以自认”，并首先倡捐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费，随之沪上诸当道，亦有捐助。此后，张之洞与康有为等“驿通朝政”，“引为声援”。但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公羊学大不以为然，曾频劝勿言此学。不过，时在1895年10月，张、康之会总的气氛是融洽的。该年十一月初，康有为偕张之洞幕僚梁鼎芬等由江宁抵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强学会，并电张謇共办此事，并与黄遵宪等切磋。十二月四日上海《申报》发布上海强学会公启，署“南皮张之洞孝达记”，其实，这篇序文为康有为代拟。1896年元月，上海强学会在上海王家沙正式设会开局，申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又刊发《强学报》，力言科举制度积弊，阐述变法当知本原，主张开设议院“以通下情”。张之洞亲信幕僚梁鼎芬、侄女婿黄绍箕也参议上海强学会章程，梁鼎芬、黄绍箕并与康有为等人合请张之洞作上海强学会发起人。

上海强学会成立不久，慈禧在北京加紧了对强学会的压迫，首先于1895年11月，将翁同龢的助手汪鸣銮和长麟以“离间两宫”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1896年元月，由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出面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随之，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下令封禁京师强学会，翁同龢等欲挽回，未果。张之洞获悉后党反攻消息，立即改变对强学会的态度，藉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用孔子纪年，遂“背盟，电来嘱勿办”⑥，下令封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这样《强学报》1896年元月12日创刊，仅出版三期，即于元月22日终刊，张之洞由赞助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到封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前后不过两个月，其脸孔变化异常急骤。但此时维新变法派的力量尚在增长中，张之洞继续与之保持着各种联系，康、梁等人对张之洞仍然抱有较高期望。

二、赞助《时务报》，邀梁启超访鄂

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被查封以后，张之洞授意以强学会余款交汪康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人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社会政治旬刊《时务报》，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任撰述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之间，风靡海内，“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⑦《时务报》创刊前，张之洞已于1896年2月返回湖广总督任内，但他对《时务报》表示了特别的支持，大力“助赀推行”，曾札饬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该年9月27日出版的《时务报》第六册，全文刊载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其大

要如下：

> 照得新报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查上海新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8]

在这里，张之洞对《时务报》的夸奖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同一札文中，张之洞希望时务报馆对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官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各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份，每份每月三角，以后按年于是月初预付。统由善后局在余闲款项下汇总支发。正因为张之洞曾如此赞助过《时务报》，所以后来汪康年有《时务报》“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9]的说法。

《时务报》创刊发行期间，维新变法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张之洞目睹维新派在朝野上下活动得沸沸扬扬，皇帝也愈来愈明确地予以支持，张之洞便决定进一步密切同维新派的联系。他在1896年8月28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穰卿（汪康年字穰卿——引者）仁兄、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引者）贤弟大人阁下：《戒缠足会叙》呈教，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助银圆五百元，已交汇号，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欲得盘桓月余，此不多及。”[10]对维新派组织，又是“坚请列名”，又是捐款资助，并邀梁启超“来鄂一游”，可谓殷勤备至。而维新派正急于争取当权人物赞助，他们在赢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以后，便进一步向张之洞下功夫。由于张之洞和变法派双方都有靠拢的愿望，便促成了1897年元月张之洞邀请《时务报》撰述（主笔）梁启超访鄂这一戏剧性场面的演出。

梁启超的身份只是举人，但因他著文宣传维新变法，名声甚大，“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1]张之洞对于这颗正在上升的政治新星给予了格外的礼遇。1896年底梁启超从广东、澳门返回上海，途中因张之洞相邀，于1897年1月中旬在武昌停留，谒见张之洞。据当时人记载，梁启超抵达武昌湖广总督督署，张之洞曾准备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下属提出，这样做“骇听闻对”，张之洞才作罢论。因为，上述接待规格，是迎接钦差大臣和敌国使臣的专用礼节。时人曾这样披露张之洞破格迎接梁启超的动机：

> 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盖是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香翁特预为媚之耳。[12]

这一记载出自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之手，语中当然多带嘲讽，但张之洞以特殊礼遇接待梁启超却并非虚构。1897年元月19日，梁启超本人在致汪康年、麦孟华的信中也谈到张之洞对他的隆重礼遇。信函说，梁启超拜谒张之洞那天，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南皮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时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13]

在梁启超方面，由于张之洞给予殊荣和特别器重而受宠若惊，“恐惶不安，因著笈称弟子。”[14]他在致张之洞的函件中追述二人相会的情景：

> 反加奖借，赐以燕见，许以进言，商榷古今，坐论中外，激言大义，不吝指授，刍荛涓流，靡不容采，授餐馈馔，殷勤逾垣。宁唯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归舟容与，喜不自胜。吾师睠焉世变，默念时局，以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因加意两湖书院、武备学堂，以观其成。诚救乱扶危第一义也……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15]

梁启超这一时期对张之洞推崇备至，并非孤立现象。严复、章太炎等人在甲午战争前后都一度寄厚望于张之洞。另一维新党人刘光第在1897年张之洞六十寿辰时，曾撰序称赞张之洞“举一切维新之新政”，“真识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哉!”[16]可见，戊戌变法前，维新士子普遍对张之洞抱有颇高企望。而张之洞与梁启超的武昌之会，可以说是张之洞与维新运动

相契合的顶点。当然，张之洞留梁启超在湖广总督督署任事，亦自有打算，他“知其所主张，必滋弊”，引入署中，可令梁“入我范围，以供驱使”[17]。但梁启超也并不准备入其彀，他因“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18]谢辞了张之洞的挽留。总之，这一阶段，张、梁之间彼此间都抱有好感，但又各怀己意，并非真正融洽。此后，张之洞与维新派立场、政见的巨大鸿沟很快便显露出来。

三、干预、控制《时务报》、《湘学报》

张之洞在暂署两江总督和返任湖广总督的1895—1897年间，先后资助上海强学会，《强学报》和《时务报》，既有靠拢维新派的打算，又有控制维新派的意图。由于《时务报》等刊物仰赖张之洞的捐助，张之洞得以在《时务报》中安插亲信幕僚汪康年，并对报刊论说横加干涉。早在1896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撰文，批评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时创办的江南自强军过于优厚西洋将弁：“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张之洞其时已返任湖广，读到这篇文章很不高兴。但这件事尚未演成直接干预刊物出版。不过，从此张之洞对《时务报》已有所保留，认为“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纯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19]以后，《时务报》连续发表更激进的言论，张之洞终于举起了杀威棒。

1896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八册发表《变法通议》三之二《科举》，批评宋学家倭仁：“误人家国”，第十册发表《变法通议》三之十三《论学会》，批评汉学家纪晓岚。张之洞对此大表“不平”，指示僚属致函汪康年“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20]1897年10月，《时务报》第四十册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谴责清廷丧权辱国，“放巢流彘”，“陵寝蹂躏”，“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张之洞读罢，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及黄遵宪，称梁文“大悖谬，阅者人人惊骇”，“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西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干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有责焉，似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21]张之洞又授意梁鼎芬致函汪康年，对梁启超加以掣肘，并以“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相警告。[22]

另一维新派健将、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在《时务报》第四二、四四、四六、四八册连载《中国除害议》，抨击科举制度。张之洞亦大不满意，令梁鼎芬致函汪康年予以抑压。梁鼎芬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指责道，“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23]又说：“徐文专攻南皮，何以刻之？岂此亦无权邪？后请格外用心。”[24]在张之洞、梁鼎芬的兴师问罪之下，汪康年将原定于《时务报》第四八册以后续登的《中国除害议》后半篇腰斩不发。即使对于汪康年本人，张之洞也加以限制。汪康年曾于1896年10月在《时务报》第九册上发表《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直截了当地鼓吹民权主义。张之洞读毕大不满，命梁鼎芬抑制之，梁鼎芬致函汪康年：“实做经理二字，千万不可动笔”，并责备其“民权”文字触犯纲常。[25]梁鼎芬还代表张之洞警告汪康年：“弟处华夷纷杂之区，耳目已淆，品类尤繁，望坚守初心，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26]汪康年秉承张之洞、梁鼎芬意旨，很少再发表“越轨”文字。以后，汪康年还竭力著文迎合张之洞。如《时务报》第五二期，汪康年撰文为洋务派张目，张之洞、梁鼎芬立即加以称赞，据钱恂致函汪康年说：“星海（梁鼎芬——引者）极夸兄五二期文，南皮亦极谓然。”[27]汪康年对梁启超百般牵制，将《时务报》的经济、用人诸方面权力抓在手中，梁启超感到无法忍耐，认为汪康年“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用”[28]。而汪康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 张之洞支持。梁启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897年11月愤而离沪赴湘，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自第五六册以后，《时务报》为汪康年和梁鼎芬所控制，“改弦易辙”，宗旨大变。1898年5月光绪帝诏定国是之际，《时务报》第六五册发表汪康年《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隐然攻击康、梁“肆其鼓簧”，又称：“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对张之洞一类督抚的“改革”大加称颂，张之洞对汪文深为夸奖，钱恂致汪康年信中说：“南皮言第六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快。”[29]此时的《时务报》已变为洋务派的喉舌。故时人评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

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30]而《时务报》的解体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张之洞的幕后施加压力大有关系。1898 年夏，上谕改《时务报》为官报，由康有为主持。在张之洞的赞同下，汪康年不缴出余款，以“空名归官”，自己另创《昌言报》，又由张之洞授意，梁鼎芬任《昌言报》主笔，“助汪敌康”[31]。对于湖南的维新派组织南学会以及《湘学报》、《湘报》等维新刊物，张之洞也采取类似对待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的态度。

十九世纪末期，湖南是维新派活动的重要舞台。“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32]。1895 年 8 月，开明政治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提倡新政，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后任徐仁铸）也都是变法运动的积极赞助者，湖南省维新之风更盛。1897 年 4 月，湖南维新派创办时务学堂、筹办新式水陆交通、开矿山、设武备学堂、组织保卫局、设立南学会，并且出版《湘学新报》（第二一册后改名《湘学报》），由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办，蔡钟濬为总理，唐才常等主编，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宣传维新变法。陈宝箴通饬各州县订购，俾阅者“皆通晓当世之务，以为他日建树之资，”张之洞开始也很夸赞这份报刊，认为“湘学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有裨士林”，“自宜广为传布。”[33]并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一体购阅”[34]。不久，张之洞发现《湘学报》颇有触犯纲常名教之处，认为“谬论甚多”，遂于 1898 年 5 月 6 日札善后局停发《湘学报》，谓“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35]

至于湖南维新派所办《湘报》发表的易鼎的文章，张之洞更觉大逆不道。他于 1898 年 5 月致电湖南巡抚陈室箴、按察使黄遵宪制止发行。电文称：

> 《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所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36]

同一时期，张之洞致函湖南学政徐仁铸指责道：

> 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37]

张之洞要求陈宝箴等“随时留心救正”[38]。陈宝箴迫于行政压力，只得劝诫黄遵宪等，“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39]也就是说，用借古喻今的曲笔，而不可直接议政。

对于 1898 年 2 月成立的湖南维新团体南学会，张之洞也取弹压态度。当朝廷来电指责“湖南省城所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约》、《札记》、《问答》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40]张之洞立即取缔南学会、保卫局。至于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对湖南维新运动更是咬牙切齿，他曾致书湖南顽固派王先谦，攻击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徐仁铸“聚于一方，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上则欲散君权，下则欲行邪教，三五成群，邪说暴作，使湘省有无穷之祸，粤有不洁之名，孰不心伤，孰不发指?”并号召湖南顽固派王先谦、叶德辉等“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41]时人说，“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42]。由梁鼎芬的言论，可以透视张之洞的心志。

总之，张之洞在 1896 年前后虽一度靠拢维新党，赞助维新刊物，但他对变法运动并非诚心拥护。严复对这一点有所洞察，他指出，张之洞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43]即使在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最融洽的时期，张之洞也对一切违背封建纲常的言论采取不调和态度。1895 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44]的《辟韩》一文，批判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的尊君思想。一年多以后，梁启超将该文在《时务报》转载。张之洞则把《辟韩》诋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撰《辨〈辟韩〉书》以辟之。据严复致其堂弟的信所说，《辨〈辟韩〉书》的作者可能是张之洞本人。严复信称：“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张之洞——引者）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也。”[45]参照张之洞撰《抱冰堂弟子记》而又托门弟子之名的作法，严复的这一猜测存在一定的可靠性。《辨〈辟韩〉书》载于《时务报》，该文鼓吹“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斥责严复“以是为

非”。《辨〈辟韩〉书》刊出后，张之洞发布《牌示》，称该文“正大谨严，与本部堂意见相合”，谕令湖北各书院学生“务须细看，奉为准绳”[46]。直到甲午战争1894～1895年期间，严复还对张之洞抱有极高企望，认为“孝帅(张之洞——引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47]严复曾希望陈宝箴把自己引荐给张之洞。但这次张之洞对《辟韩》一文大张挞伐，使严复对张之洞的幻想归于破灭。

四、出版驳诘“民权说”的《劝学篇》

随着维新变法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老练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48]，他还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坚决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出于权术的考虑，他也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从“预为自保计”，他于1898年4月撰写以“辟邪说”为目标的《劝学篇》[49]，对维新变法思想展开了正面进攻。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其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 自乙未（1895年——引者注）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50]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既批评顽固派的“守旧”、“不知通”，也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也即企图在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求第三条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这便是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当然，《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诬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之洞在戊戌年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51]

五、出主新政的试探

戊戌年间，正当张之洞酝酿着抛出《劝学篇》，拟办《正学报》之际，光绪皇帝却期望张之洞出来主持新政。这是因为，光绪帝虽有变法之志，却并无必要的权力，所以，他在依靠康、梁的同时，还要物色握有实权的重臣。张之洞固然已经表现出若干不赞同新政的端倪，但他此时给人的主要印象，是一个“政绩昭著”的洋务大吏，且与维新派多有联系。与此同时，他又是慈禧“手擢之人，”可以为后党所容，以其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合两宫”[52]。这些特定的复杂因素，使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之际成为光绪帝和一些官僚所瞩目的人物。如袁世凯曾上奏：

>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53]

由于张之洞被清廷公认为“明达时务，老成持重”者，故经杨锐、乔树枬向大学士徐桐建议，徐桐立即疏荐张之洞入京。亟欲争取重臣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于1898年5月，电召张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湖广总督“著谭继洵暂行兼署。”[54]

张之洞接旨，立即上奏表示感激：“臣远离阙廷已逾十载，依恋之诚常萦梦寐，恭闻恩命，获申瞻觐之忱，曷胜欣幸。”[55]他兴致勃勃，大有春风得意之状，“昼夜不息”地作准备，于5月7日交卸篆务，11日起行，15日行抵上海。恰在此间，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之案”，朝廷指示，“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56]当然，沙市发生小骚乱，只是朝廷要张之洞折回本任的借口，实质性原因是帝师翁同龢对光绪进言，张之洞“不可恃”[57]。翁、张历来有隙，八十年代即彼此攻讦，势同水火。戊戌变法前，光绪帝对翁同龢深为信任，“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58]，张之洞便曲意攀附，曾致函“贵为帝傅”的翁同龢，吹捧其为“敷陈古义之儒宗，兼通达时务之俊杰”，表示“我公蕴道匡时，万流宗仰，慨然以修攘大猷提倡海内，内运务本之谋，外施改弦之法，凡有所指挥所及，敬当实力奉行，以期仰副荩悃。”[59]但宦场老手翁同龢并不信任张之洞，认为张之洞决非真正拥护维新运动，不能依靠，“会沙市有教案，乃与张荫桓

密谋，中阻。张已至上海，奉旨折回”[60]。这样，张之洞在戊戌年间“内召”赴京参预变法一事就搁置下来。经过这一曲折变化，张之洞对朝中的派系角逐的危险性颇有几分胆寒。1898年9月，陈宝箴拟电总理衙门，建议张之洞入京襄赞新政。张之洞致信陈宝箴说，“自未便遽请北上，且自顾迂庸孤陋，即入都一行，岂能有益时局，唯有听其自然”[61]。

综观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全过程的表现，可用“狡兔三窟”来形容。他在这次事变中出尔反尔的行径，使他“向日声名堕之于涂炭”，“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62]关于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前后的矛盾表现，《世载堂杂忆》记有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

> 戊戌前，张之洞由鄂省移督两江，游焦山，题长歌于松寥阁，颇有感慨时局，左袒维新诸贤之意，寺僧精装悬壁。政变事起，节庵（梁鼎芬，字节庵——引者）先生乘小兵轮由汉星夜抵焦，问寺僧张督题诗尚存否？寺僧出轴曰：不敢损坏。梁曰：张督欲再题跋于后，题好还汝。携卷归，裂而焚之。广雅集中无此诗，夏口李逮闻居焦山，曾抄得。[63]

这段故事属于稗官野史，是否属实，尚不敢断论，但它却活画出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反差强烈的状貌。而这种状貌正显示出洋务大吏与维新运动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

---

①⑬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82、53－54页。
②张之洞：《普天忠愤录·序》，《普天忠愤录》，第3—4页。
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源》，《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册，第113页。
④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4)第134页。
⑤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叙》。
⑥《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八岁。
⑦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⑧《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
⑨汪康年：《昌言报跋》，《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⑩《张之洞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⑪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
⑫⑭王伯恭：《蜷庐随笔·潘文勤师》。
⑬梁启超：《致汪康年、麦孺博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⑮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
⑯刘光第：《湖北总督张公六十寿辰》，《衷圣斋文集》。
⑰《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⑱⑳杨复礼：《梁启超年谱》。
⑲㉒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17页。
⑳《顾印愚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㉑《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电》，《张文襄公电稿》卷二九。
㉓㉕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㉔㉖㉘㉙钱恂：《致汪康年书》，《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㉚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纪》。
㉛叶瀚：《致汪康年》，《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㉜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
㉝㉞张之洞：《咨会湘学院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牍》，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湘学报》第一五册。
㉟《札善后局停发湘学报》，《张文襄公公牍未刊稿》第一四册。
㊱《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电》，《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五，电牍。
㊲《致长沙徐学台》，《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五。
㊳《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电》，《张文襄公电稿》卷三〇。
㊴《张之洞未刊文稿·各处来电》(戊戌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㊵《光绪实录》，卷四二八，第3页。
㊶梁鼎芬：《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二，第2页。
㊷《咄！张之洞劾梁鼎芬》，《新民丛报》第二二号《国闻短评》，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㊸严复：《论中国分党》，《国闻报汇编》卷上，第11页。
㊹王蘧常：《严几道年谱》，第29页。
㊺原件藏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
㊻《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
㊼见严复致陈宝箴，原件藏福建省博物馆。
㊽《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㊾一说《劝学篇》为张之洞幕僚起草，张之洞定稿。
㊿《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第14页。
51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第9页。
52 57 62《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事略》。
53袁世凯：《戊戌日记》。
54 55《恭报交卸起程日期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七。
56《恭报折回本任日期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八。
58《清史稿》卷四三六，《翁同龢传》。
59《张文襄公未刊函稿·致翁叔平尚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60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
61《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五五，电牍三四。

（作者冯天瑜：湖北大学历史系教授；邮编：430000）